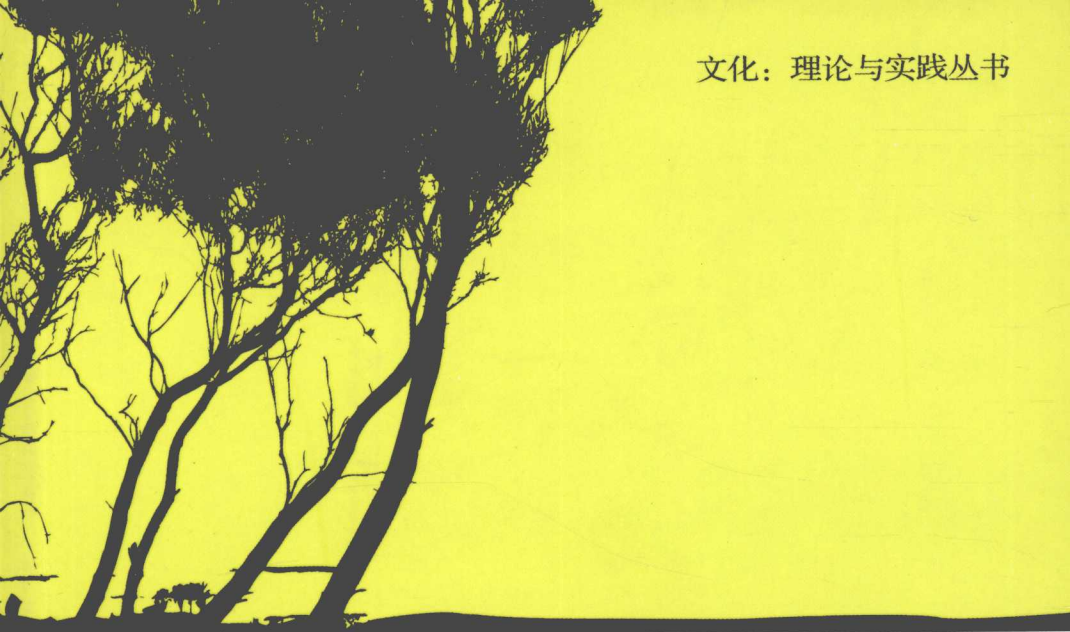


文化：理论与实践丛书



SHENGTAIPIPINGSHIYUXIADEZHONGGUOXIANDANGDAIWENXUE

生态批评视域下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

王喜绒等 著



生态批评视域下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

王喜绒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批评视域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 王喜绒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004-7652-8

I. 生… II. 王…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5947 号

策划编辑 郭沂纹
责任编辑 郭沂涟
责任校对 刘俊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订 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339 千字

定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丝绸之路悠扬的驼铃声不断放飞着中华民族的飞天梦，黄河古道的滚滚洪流始终搏击着华夏儿女的文化血脉。边塞大漠上的长河落日，辉映过金戈铁马的雄姿，祁连山脉中的清冽雪水，浇灌出了朵朵文化奇葩。中外文化曾在这里交光互影，众多的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西部的历史——透着贫瘠和苍凉，也透着强劲与神奇。

大开发的号角又一次震起了西部人马踏飞燕的英雄豪气，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在阳关古道上重新撒下了纷飞的丝路花雨。汉唐气魄曾使我们胸纳东西，眼放四海；腾飞的中华又让我们探首国外，博采众长。今天的西部——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正一跃而起！

我们尽管还不是物质上的富有者，但却是厚重文化积淀的承载者；身处边远西部，却不乏科学上的求索勇气。丛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理论与实践——西部论坛》，既是我们对历史的呼应，又是试图跻身文化前沿，与学界的交流与对话。我们苦苦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交错的空间，开掘于多学科渗透的沃土，思索于理论光照下的新大陆，探索于多元文化交汇碰撞的冲积层，力图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这套丛书就是长途跋涉的产物。我们深知，西部需要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也需要文化上的大繁荣。

忆往昔，丝路繁忙，浩瀚大漠振雄风；看今朝，春风浩荡，

2 总 序

羌笛琵琶翻新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海大潮中，我们的声音也许微而又微，但只要呐喊，希望就在前面。

兰州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 王喜绒

2003 年 10 月 22 日

前言

—

生态批评理论传入中国之后，以鲜明的生态意识对创作文本进行有别于传统的批评和研究，很快成为文学批评领域的热点话题。在这一理论视域下，不仅中外文学史上许多名家名作被重新解读和阐释，就是不少民间文学作品也成了生态批评者们关注的对象，以致一时之间，文学文本的生态批评成果犹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我们的这本《生态批评视域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正是这一批评语境下的产物。

然而，与时代最新批评潮流的这种呼应，却并非是要“追风”，而是源于实实在在的时代忧患，因为众声喧哗的生态危机早已超越单一的社会、民族、国家的界限，成为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难题，成了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真正的跨学科问题。

诚如邢贲思先生所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生存与发展”是其面临的永恒主题。但是由于“传统的发展观往往片面地追求经济的增长，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去换取经济和社会的繁荣。特别是 20 世纪以来，工业化进程造成对自然资源

2 生态批评视域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的掠夺性开采和环境污染的日趋严重,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由此也使人类的生存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① 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环境污染,热带雨林丧失,基础原材料枯竭,土壤损耗,沙漠化加速,物种灭绝,遗传多样性减少,自然灾害频发等等,都已成为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流行语。不仅如此,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在恶化了人的生存环境的同时,还带来了严重的“精神污染”: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物欲横流,精神衰微,“人的‘意志能量’不再‘向上’仰望,而是‘向下’、向着永远填不满的欲望之壑‘猛扑过去’”。^② 换用詹姆斯·乔埃斯的话说:“现代人征服了空间、征服了大地、征服了疾病、征服了愚昧,但是所有这些伟大的胜利,都只不过在精神的熔炉里化为一滴泪水!”^③ 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健康生存。如果说自然生态危机使人类正在丧失可以栖居的物质家园,那么普遍的精神危机又使人类正在失去可以安息灵魂的精神家园。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尚处工业化发展道路上的国家,尤其如此,也就是雅斯培(K. Jaspers)在《人类的将来》一书中所指出的:“工业技术的时代把我们生活所依恃的一切问题化。”^④ 置身于这种生态危机中,尽管程度有大小之别,但每个人都是直接的受害者。正由于此,作为解构生态危机而兴起于西方的生态批评,一经传入中国便迅速引发强烈反响,并很快成为文学研究领域里一支颇具魅力的批评潮流。我们的汇聚于生态批评旗帜下,正是对其勇

① 邢贲思:《序》,见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参阅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③ [法]詹姆斯·乔埃斯:《文艺复兴运动的普遍意义》,载《外国文学报道》1985年第6期。

④ K. Jaspers, *The Future of Mank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 72.

敢抗衡生态危机的共鸣。尽管我们也清楚，作为一种文化批评，它对现实生态问题的干预绝不会立竿见影，工业化的进程并不会因此就稍稍放慢一下自己的脚步；但是我们也坚信，这种批评以其深刻的文化反思和直面现实的勇气所洞察的人类的内在需求与工业文明之间的某种潜在冲突，却会积淀为一种恢弘的弱效应，它在潜移默化之中就会完成对现代人的生态启蒙，使他们对业已习惯了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明取向等，做出根本性的调整，从而为人类终将实现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持续地发挥作用。可以说，正是带着这样一份信念和期盼，我们才毫不犹豫地投身于生态批评大军中，希望在自己的文学批评“变绿”^①的过程中，为现代生态文明的解构与重构，做出一份切切实实的努力。

二

对生态批评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庞杂、开放的批评体系，兼有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特征。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诸多的分支学科。但无论怎样庞杂、开放和分支众多，所有的生态批评都围绕着一个基本的问题展开，这就是人（包括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的关系问题。这不仅在于人类世界、人类文化的发展，总要对自然世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又被自然世界所制约。也就是郑惠子先生所说的：“由于人作为一个物种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必须对自然的自发运行状态进行干预，人在自然面前不可能无所事事，这是一种必然性；同样

① 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举办的学术讨论会，其议题就是：“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绿色化”。

4 生态批评视域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是从人的角度看，随着人的道德意识的不断成长，人在新的共同体中的角色的自我确认，人也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在自然中随心所欲地去行动，即人必须把自己的行动限定在自然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内”；^① 还在于生态危机的形成本源于人类以自我为中心，与自然的主动“交恶”。曾经气壮山河的工业时代的主流观念——“竭力把人和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层面上剥离出来，把自然看作一个低下乃至低贱的层面，把人凌驾于自然之上，把科学技术凌驾于人的生命之上，把经济指标的增长看作社会进步的唯一尺度，把人的进化程度与社会发达的程度等同于人与社会摆脱自然约束的程度”，结果却酿就了深重的生态危机，便是典型一例。^② 作为生态批评一个分支的文学的生态批评，虽有不同于其他分支学科之处：聚焦于生态关注与保护的“文学方式”。但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呈现，依然是其凝神观照的一个最基本的内容。也正是这一独特的审美视点，便在文学的生态批评与传统的文学批评之间划开了一条鲜明的界线。

首先，批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传统的文学批评是“以人中心”，基于“文学是人学”的基本理念，它所关注的文学构成“四要素”——作者、读者、作品和客观世界——中的“世界”，是指人的世界，或者叫“人类社会”。然而文学的生态批评却打破了这一传统认知，变“以人中心”为“以自然为中心”，这就把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世界”概念，由“人类社会”一下拓展到了整个“生态系统”，从根本上颠覆了“文学是人学”的传统理念。这种转变无异于一场世界观的革命，它使人得以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用生态主义的眼光重

① 郑惠子：《走向自然的伦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201页。

② 参阅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新打量外部世界。在这一崭新视域下，处于整个生态系统中的
人，不仅不是中心，不是自然的主宰，相反作为自然的一分子，
要求得自身的健康发展，既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像尊重自己的生
命那样去尊重其他生灵，还要处处效法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
依据这一立场对作家笔下的文本世界进行批评，一种迥异于传统
文学批评的崭新视角和逻辑起点就会形成，而随着视角和逻辑起
点的彻底转换，批评也将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理论图景，从而
让文本中的人与自然问题得到全新的解读。

其次，是“自然审美”在文学批评中的回归。就像一些环
境美学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启蒙理性一直忽视自然，随着它的
不断壮大乃至膨胀，自然美的概念一度被完全抑制了，“自然蜕变
成了完全为人类控制和改造的对象，任何对自然的崇尚都显得不
合时宜。在这些启蒙思想家们看来，最值得颂扬的是人、人的理
性或精神”。^① 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阿多尔诺对此颇有研
究，他说“启蒙理性”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工具理性”，^② 它要
达成的是对自然的控制以便满足人类的需要和愿望。在他看来，
现代人对于自然的轻蔑与对人工产品的推崇是一致的，对自然美
鉴赏的漠视与对自然物实用的热衷是一致的，“正是工业文明与
自然的冲突，导致了自然美从人类视野中的消失”。^③ 反映在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在科学技术耀眼炫目的光芒下，曾经
容光焕发的‘大自然’在文学艺术家的目光中早已经黯淡下来。
‘自然’被‘科学’从文艺批评界放逐出去。不要说批评家，就
连一些在文坛上享有盛名的小说家，也不愿意再为‘自然’多

① 彭锋：《完美的自然——当代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5 页。

② 同上书，第 177 页。

③ 见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4 页。

写几个句子”。^①然而，文学的生态批评却把自然审美放到了中心位置，把一种至少是与人平等的伦理地位赋予了大自然。在这种批评视域下，“缺席”已久的自然不仅拥有了存在的权利，还拥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内在价值和规律。不仅文本中的自然形象、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要得到重点探讨，由此折射出的作者的自然观、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的社會文化因素，也要得到深度开掘，它使传统文学批评中那种漠视自然审美，充其量也只是作为人物活动背景被论及的批评姿态，由此被彻底逆转。

还有，对现实的强烈干预，或曰“实践性”的品格。20世纪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一直是以“语言”和“文本”为中心的。它们绕开作品产生的现实语境，单纯就文本分析文本，陶醉于对语词世界进行形式主义的解读，这就让文本和现实之间一直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使文学批评陷在狭小的文人圈子里，越来越趋于“贵族化”。然而，文学的生态批评却毅然拆除了这种“语言中心”和“文本中心”的樊篱，坚持让批评回到现实问题中来，通过人与自然关系视角的锁定，将文学批评与社会批评、文化批评紧密联系起来，如同后现代语境中那些以种族、阶级、性别等为视角的文学研究一样，“不仅以解读世界为目的，还试图跨越文本与现实的鸿沟，通过改变读者的意识及其同作品关系的方式来改变世界”。^②这就使批评带上了鲜明的“实践性”品格，它对缓解现实的生态危机，重构现代生态文明，都有极为现实的意义。事实上，生态批评的核心任

①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页。

② Stan Tag, “Four Ways of looking at Ecocriticism”, <http://www.asle.umn.edu/conf/other-conf/wla/1994/tag.html>.

务就是要唤起和增强读者对人类存在的“环境性”意识——即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只是他们所栖居的生物地质世界的一部分。美国生态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和发起人彻丽尔·格劳特菲尔蒂就曾这样界定生态批评：“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批评。”^① 它主要分析探讨自然环境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文化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考察自然的含义是如何赋予的，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关系是以何种方式呈现的，人类在赋予自然价值的过程中拒绝和排斥了哪些价值，人类的思想、文化以及社会发展模式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等等。这种立足点和矛头所向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学的生态批评虽然是文学批评的一种，但却必须实现“向外转”的自身突破，对当下的生态危机发挥积极作用。

以上三个方面，既是文学的生态批评迥异于传统文学批评的鲜明特点，也是本书尽力追求的突破和所彰显之处。尽管说愿望与现实之间常常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但它始终是我们的努力方向。本书写作的初衷就是要将心中那点对“绿意”的追求与向往奉献给读者，期望它能把人们引向对大自然的“心灵朝圣”。

三

如书名所示，我们所作的文学的生态批评限定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批评的着眼点是创作文本中的人与自然。这既是20世纪以来的现当代作家较少驻足凝神观照之处，也是社会学批评框架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人声最为寂寥、遭遇误读与贬抑最多的地方。但是在生态批评的视域下，它能够焕发出不因岁月的推移而失却其艺术魅力的特殊意义。

① 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

反思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人与自然的主题是纵贯中国文学的重要母题之一。在古典文学史上，从神话传说、游记到诗词，自然始终是人们的一个重要审美对象。由于“我国东临浩渺大洋，西有擎天高山，既有干旱的大漠草场，又有湿润的丘陵平原。先辈们生活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秉山川之灵，关天地之运，神与物游，意与境谐，思维方式，心理感应，艺术创作，无不受到启迪。天人合一的传统，加深了自然与文艺的内在联系”。^①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就是中国人亲近自然、体味自然、再现自然的历史。

然而进入 20 世纪后，民族忧患的声浪却对这一主题形成了强力遮蔽，自然在文学中的地位开始一落千丈。陈独秀高揭起的文学革命大旗上大书特书的“三大文学主张”中，醒目的一条就是“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随着新文学干预社会、干预政治的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社会性的人成了文学作品的主体，原本地位显赫的“自然”迅速被挤压到了边缘地带。新中国成立后 17 年，包括“文化大革命”十年，“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时代氛围，使人们热衷于“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于是在这一时期的主流文学作品中，人与自然之间原本应该充满诗意的和谐共振，便往往被矛盾对立的书写所替代，人是主体，自然是被人改造、征服和利用的客体，成为一种生活的“理想态”。纵使一些叙事性作品中还穿插有对于自然的描绘，甚至是非常精彩的描绘，“但从整体上看，自然不能再与人事人情对等

^① 胡兆量、阿尔斯朗、琼达等编著：《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5 页。

地存在”。^① 它往往沦为舞台上的“布景”和“道具”。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一开始面对的主要还是极“左”路线下“人”的不公正待遇问题、文化反思问题、改革开放问题，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自然理所当然地不能与人事并驾齐驱。20 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与自然的严重疏离不仅体现在可以丈量的现实距离上，也体现在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心理距离上。就像阿尔·戈尔先生所描绘的：“在感性上，我们离超级市场更近，而不是麦田，我们对包装面包的五彩塑料纸给予更多的关注，却较少关注麦田表土的流失。于是，我们越来越关注用技术手段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我们与自然界相联系的感受却变得麻木不仁了。”^② 这种现实进入主流文学创作中，自然不仅仍然无法挤入“主角”的行列，“甚至连‘配角’也当不上了，常常只能充当‘反面角色’”。^③

然而，这只是 20 世纪代表着时代前进方向的文学“主潮”。如果细细加以检视，人与自然的主题虽然从时代的中心话语中退出，但却并不等于不存在。由于人既是社会化的人，又是自然中的人，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国仍然处于农业文明中，人与自然的联系较之工业文明社会要密切得多。再加上儒道互补的传统文化人格结构，这诸种因素都使一些作家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同时，又时不时地走出时代主流话语，在自然中放飞自己的心灵，从而在自觉不自觉中接续着人与自然的传统主题。纵使一些高扬时代主旋律的作品，也在有意无意之中选择了人与自然的书写视

①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6 页。

② [美] 阿尔·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77 页。

③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8 页。

角。再加上审美的境界总是与自然密切相关,用 A. N. 怀海特先生的话说,“伟大的艺术就是处理环境,使它为灵魂创造生动的、转瞬即逝的价值”。^① 现当代文学虽然重在表现人事,但“人要在现实客观存在,就必须有一个周围世界,正如神像不能没有一座庙宇来安顿一样”。而这个世界“首先跻到我们面前来的就是外在自然”,^② 这也决定了文学创作中自然书写的不可或缺。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生态危机的日趋严重,以新的观念、视角和手法描绘“自然主题”的作品,也开始出现。可以说,人与自然的文学书写在现当代文学中虽然不再如大江大河,汹涌澎湃,一路高歌,但也如涓涓细流,默默地长流不断。

但是,对于现当代文学领域的这一存在,社会学框架下的文学批评基本上都采取了拒斥的态度,不是被漠然置之,就是以其游离于主流话语之外,无法对彼时彼地的社会、政治产生积极作用,而遭到批评与否定。纵使一些通过自然审美高扬了时代主旋律的作品,虽然也受到肯定与好评,但却极少有人从人与自然的角度的去对它们进行品评。与此相适应,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完全同步的文学历史的书写,也少有人与自然主题的位置。包括一些文学理论著述中,“‘自然’仅仅被当作人物活动、事件发生的‘环境’,由原先的‘主人’降格为‘仆从’,旁落到附庸的地步”。^③ 应该说,正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这种昨天,在无意之中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进入其中进行另一种开掘的可能,而生态批评的走入中国,也赋予了我们逆转传统的主流观,实施这种开掘的理论武器。如果说在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框架内,由于评价的参

① 参阅[英] A. N. 怀海特《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191—193 页。

② 黑格尔:《美学》(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312 页。

③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6 页。

照系是现存社会的政治需要，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人与自然的书写与时代主流话语的现实距离，是它的需要指斥的消极意义；那么生态批评则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评价视域，由于转换了切入的角度、观察的视角和评判的标准，于是这些书写中所蕴涵的对现代生态文明重构有所裨益的丰富的生态资源，顿时拥有了超越时空的审美价值与意义，它不仅很值得深入开掘与研究，同时，这种批评也把我们期望缓解生态危机的努力落到了实处。

四

本书的撰写工作由我和我的研究生完成，原计划以《生态批评视域下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为题。其所以如此构架，是因为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人与自然主题的书写由中心到边缘的转折，是从清末民初的近代文学开始的。就像我在《比较文化视野的形成与近代小说的勃兴》一书中所说的，如果用今天的文学眼光考评 20 世纪初期的小说，大多数的创作确实还至为幼稚，有的甚至稚嫩到尚不具备小说文体的基本特征。但是“如果把这一时期的小说放到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将其作为从古典到现代的一个过渡阶段进行审视，我们就会发现正在积极融合外来新质，努力走出传统的近代小说，在近代化的道路上，也表现出了诸多不同于古典文学的若干鲜明的美学特征”。^① 自然审美的边缘化，就是其中之一。亡国灭种的危险使这一时期的进步作家，急国家、民族之所急，积极追求把满腔的忧患感受化为对现实政治的毫无保留的深度投入，这就为创作在“觉世”上定

^① 王喜绒：《比较文化视野的形成与近代小说的勃兴》，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2 页。

位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这种时代语境下，疏离政治、疏离社会的自然审美，自然而然就退到了边缘位置。进入五四之后的新文学，只不过强化了这一“转向”而已。所以就这一角度来说，将20世纪中国文学视为一个整体，对作家、作品的自然审美进行纵向上的系统梳理和解读，不仅视野开阔，研究的成果肯定也会厚重得多。然而遗憾的是，由于能力、精力的双重限制，在成书的过程中，不仅舍弃了近代部分，就是现当代文学的生态批评，也只是选择了有代表性的几个点，以点带面。好在探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人类共通意识，让其为缓解和消弭当下的生态危机发挥作用，既是当下文学研究中一个亟待深入开掘的重要课题，也是今后要持续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地球人类面对的生态问题，是一个拥有‘绝对价值’与‘终极价值’的性质的问题”，^①只要我们这个星球的生态危机得不到有效的缓解和消除，生态批评就绝不会缺失诱人的魅力。特别是在工具理性依然主宰着人类社会，现代文明使我们离真正的自然越来越远的今天，就尤其是如此；另一方面，在这人与自然严重割裂对立的时代，也许只有在文学家想象的世界中，还为人类的心灵保留着一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净土。而这一净土中蕴涵着大量的生态思想与生态智慧，它对当下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既包括自然生态危机，也包括文化生态危机，都具有某些根源性的解困能力。所以把自然放到一个与人血脉相关的位置上去，通过开掘文学文本中所积储的宝贵的生态资源，让读者重新回到与自然的“接触”中去，便有望为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发挥积极作用。此外，“自然本身就是一部不断延续的历史，它永远不会完结。为此，研究自然与人类的关系这一主题，也是一个

①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87页。